

《祝福》中的“我”为何决计离开鲁镇

■ 徐志伟

【摘要】鲁迅的《祝福》中两次出现“无论如何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”，这一细节并非闲笔，而是《祝福》主题复杂性与深刻性的体现：正是因为这一细节的存在，使得《祝福》的主题超越了当时流行的“国民性批判”，指向了对现代启蒙主义话语的反思。

【关键词】鲁迅 《祝福》 国民性批判 启蒙话语

《祝福》是鲁迅“离去—归来—一再离去”叙事模式的重要代表作，也是鲁迅被解读最充分的作品之一。但目前学界已有的解读大都聚焦于祥林嫂这一人物，而对其他人物、线索则缺少足够的关注。尤其对于小说中两次出现的“无论如何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”这一关键细节，学界尚未给出很好的解释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对小说多重意蕴的认知。

要想分析“无论如何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”这一细节的意涵，需要从小说中的对话入手。在小说中，返乡者“我”与故乡人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对话。第一次是“我”与本家长辈鲁四老爷的对话：

一见面是寒暄，寒暄之后说我“胖”了，说我“胖”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。但我知道，这并非借题在骂我：因为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。但是，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，于是不多久，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。……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，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《康熙字典》，一部《近思录集注》和一部《四书衬》。无论如何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。

从小说第一段中的“虽说是故乡，然而已

没有家”一句来看，鲁镇仅仅是“我”的出生之地，如今的“我”和鲁镇并无密切的联系。“我”和鲁镇之间的关联，只剩下血缘和记忆，除此之外，“我”基本上和一个“外人”无异。而“我”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外人，并不是因为离乡时间太久以及对故乡的人与事的陌生，而是因为心理上与故乡的区隔。这种区隔主要缘于知识系统的差异：“我”是一个新派知识分子，鲁四老爷是一个老派乡绅，在二人眼里，知识不仅仅是知识，更是一种资本，“我”因握有新知识，所以对讲“理学”的鲁四老爷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；而鲁四老爷对康有为等新党及新学素无好感，不屑一顾。鲁四老爷之所以有藐视新党新学的底气，主要源于他在鲁镇的社会形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在鲁镇这个宗法色彩浓重的地方，鲁四老爷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，我们在作品中至少可以看到，他是宗族祭祀活动的操办者，同时，他也能为祥林嫂这样的底层女性提供工作岗位。相对于鲁四老爷，“我”则空有知识上的自信，与鲁镇社会格格不入，对鲁镇社会毫无现实的贡献，底气明显不足。二人的对话在尴尬中收场在所难免。对于故乡而言，

“我”此时只是一个“多余人”，面对这一窘境，离开自然就成了最为自尊的选择。

小说中的第二次对话发生在“我”与祥林嫂之间，当“我”在河边遇见乞丐模样的祥林嫂时，“我就站住，预备她来讨钱”。但祥林嫂并没有讨钱，而是向“我”提出了三个关于魂灵有无的问题。在祥林嫂问题的逼迫下，“我”意识到“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，什么踌躇，什么计画，都挡不住三句问。……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，迈开步便走，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，心里很觉得不安逸”。

“我”与祥林嫂之间的对话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对话之一。这段对话究竟反映了什么？很多研究者认为这段对话反映了宗法制度造成了祥林嫂的极大不幸，使她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。但我们如果仔细分析细节，就会发现，仅仅把祥林嫂的不幸归因于宗法制度，是缺乏足够说服力的。这种阐释有意无意地略去了造成祥林嫂精神失常的最直接的原因。对此，周作人曾一语道破：“其精神失常的原因乃在于阿毛的被狼吃，也即是失去孩子的悲哀。”^[1]“失去孩子的悲哀”并不是宗法社会所独有的，在某种程度上讲，它是一个偶然性事件，并无社会属性，无论是在传统社会，还是在现代社会，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事实上，祥林嫂所提出的问题是民间社会非常常见的问题，与其说这些问题是愚昧的表征，不如说是底层穷苦人的生存哲学，其中蕴含了对现实的绝望以及反抗绝望的可能。祥林嫂提出的问题共有三个，第一个问题“一个人死了之后，究竟有没有魂灵的”，明显包含着祥林嫂对现实的绝望以及对解脱的寻求；第二个问题“那么，也就有地狱了”，指向祥林嫂对死后被锯身的疑惧；第三个问题“那么，死掉的一家的人，都能见面的”，是祥林嫂内心的真正期待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期待，祥林嫂

才战胜了被锯身的疑惧，实现了对绝望的反抗。这其中体现的其实是穷苦人所特有的一种生死观，即死掉的人能够回到亲人与祖先那里，与他们重新团聚，犹如现世，能再享幸福。这是穷苦人在绝望中的一种想象，同时也是对绝望的一种反抗方式。

李欧梵先生曾对祥林嫂的三个问题做过不同的解读：祥林嫂“向‘我’提出的问题是从小迷信出发的，却有一种奇怪的思想深度的音响”^[2]。笔者虽不赞同过度夸大祥林嫂的思想深度，但祥林嫂的问题至少不是一句“迷信”就可以打发的，她的问题显然关乎底层穷苦人的精神世界与生存哲学。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对话过程中，“我”的心理变化。祥林嫂的一个问题虽然让“我”悚然，但尚不足以改变“我”的知识自信，“对于魂灵的有无，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”这句自述，大致表明了“我”是一位对“科学理性”高度认同的现代知识分子。但面对祥林嫂接连抛来的后两个问题，“我”开始“支吾”“胆怯”，直至语无伦次，干脆承认“我也说不清”，这表明“我”的自信此时已经被摧毁。自信全失的“我”最后只能狼狈地选择逃离——不只是从河边逃离，还要从鲁镇逃离：这时“我”再次重申“无论如何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”这个决定，表明祥林嫂对“我”所造成的刺激更甚于鲁四老爷。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，“我”在一个“迷信”的底层女性面前却胆怯了。为什么胆怯？因为，“我”顿然发觉：祥林嫂的困惑和痛苦是真实的，“我”并没有能力给祥林嫂带来任何慰藉。祥林嫂的问题在现代知识范畴之外，不是简单的现代理性所能回应的。“我”虽然在空间上逃离了，但祥林嫂的问题在“我”头脑中挥之不去。即使“我”不断地自我安慰、辩解，也无法消除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。“我”无力面对故乡的文化与意义世界，也无力回答祥林嫂所提出的

“语文品质” 笔记

■ 王尚文

我们汉语的词汇极其丰富，仅“一”字开头的词语就有一部专门的词典：《一字长编》，厚达 478 页。我想，古今任何个人都不太可能掌握其全部，即使有关专家恐怕也没有胆量夸此海口。而具体到某一个词，也往往是“说有易，说无难”。例如“无时不刻”与“无时无刻”，虽《辞源》《辞海》《汉语大词典》等均未收录，但它确实实实在活人们的口头笔下。安汝磐、赵玉玲编著的《常用词语错例评改手册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年版）990 页说：

“无时不刻”应为“无时无刻”

对于失明的恐惧几乎无时无刻地缠绕着这位未来首相。

问题。祥林嫂的困惑并不比“我”的困惑肤浅，“我”只能黯然离开。

分析至此，我们大概可以明白鲁迅安排“无论如何，我明天决计要走了”这一细节的用意：鲁迅正是通过这一细节来凸现代启蒙主义话语在“乡土中国”语境中的软弱无力及其难以克服的局限。在鲁迅看来，所谓的“启蒙”事业在很多时候仅仅是知识分子聊以自慰的幻觉，民众其实一直在他们的话语之外。正是洞察到了现代启蒙主义话语的症结，鲁迅没有让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像刘鹗的《老残游记》中的老残和梁启超的《新中国未来记》中的黄克强那样对民众采取救治行动，而是让他们选择黯然退

从规范的角度看，应将上例中的“无时不刻”改为“无时无刻不……”。由“无……无……”构成的成语较多，如“无边无际”、“无法无天”、“无尽无休”、“无拘无束”、“无亲无故”、“无穷无尽”、“无声无息”、“无依无靠”、“无影无踪”等。

指出所引句子应增加一个否定词“不”，这确实很对；但认为“无时不刻”不规范，似乎就缺乏理据。我是浙江东南部山区人，小时候就听说并会用“无时不刻”“无时无刻”这两个词。当然这不足为凭。于是查“读秀”，除了上引这一条，其余 5543 条都是正面的（即都是把“无时不刻”当作规范词来用的例句），其中还不乏林清玄、顾城等名家。再说，由于“由‘无……无……’构成的成语较多”就能够成为认定“无时不刻不规范的理由吗？显然不能，这是常识。包括词汇在内的语言现象极其纷繁复杂，其中任何一种现象做出某种判断，包括一个词是否规范，都必须十分谨慎，千万马虎不得。

总之，对语言，对语文品质，我们要有敬畏之心。

（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21004）

场。而等待这些黯然退场的知识分子的，就是灵魂无所依附的彷徨与孤独，于是也就有了鲁迅后来《在酒楼上》和《孤独者》的写作。

[1] 周遐寿.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 [M]. 石家庄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2002：193.

[2] 李欧梵.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[M]. 上海：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2：155-156.

[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发现另一个‘乡土中国’——勾连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一种考察”（编号：11FZW016）的阶段性成果之一]

（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150025）